

# 隋唐初对六朝文学之评价

邊成圭\*

## 目次

六朝文学的艳丽之风  
李谔对浮艳文风的批评  
王通的政教中心说  
魏征等初唐史家对六朝文学的态度  
餘論

歷經南北朝的分裂后，隋与唐接着再度统一中国，建立新王朝，开启新时代，同时为避免重蹈歷史乱局，新王朝当然也开始试图重建新时代的主流意识。简而言之，就是回到儒教传统，重新确认儒家思想的地位。而隋末唐初儒家思想之所以重新受到重视，并在体制上巩固其地位，基本上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是隋唐对儒家政教思想的大力支持，第二则是人们对魏晋南北朝时代有‘清谈亡国论’之称的魏晋玄学，极盛一时的佛教及堪称国教的道教等三大社会主流思想产生反感之故。

在重新确立新时代主流思想的过程中，新王朝对于前朝文学即六朝文学则持否定看法，认为六朝文学是浮华艳丽的彫虫文学，六朝之所以灭亡，其文学有不可回避之责任。在儒家思想中，‘文’的内容包括天地及人文等各种精神文化在内，文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文与文学应负起教化风俗的社会责任。然六朝的文学却脱离现实，既没能负起教化之责，亦完全无法发挥其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这也是隋朝及唐初文人否定六朝文学最大理由。

\* 漢陽大學校 國際文化大學 中國學科 教授, skbyun@hanyang.ac.kr

隋朝与唐初的文人以儒学为武器，从政教思想的层次重新檢討六朝的文学，而在批判六朝文学浮华不实的同时，主要也瞄准六朝文学的价值观，使得六朝文学本身的价值亦遭贬低。然儘管如此，宫廷和文人仍生产大量作品，文人也同样通过文辞的修饰进入官场。尤其像唐太宗虽曾正式公开表示反对六朝式的创作方式，与六朝式文学保持距离，但他个人却喜欢王羲之及陆机，并模仿宫体诗作诗。

大致而言，这种思想主张与实际创作间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议题——即文学与政治之间力学关系变化过程的呈现。李诤对六朝文风的批评，王通的政教中心说，以及思考文学应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魏徵等人之主张在较早时期即讨论到中国文学中典型的政治驯服文学问题，因此值得我们深入加以探讨。他们对六朝文学的批评，反而证明了文学在政治强大的压力下自行寻找生存空间的生存能力。

## 六朝文学的艳丽之风

隋末唐初对六朝文学的批评焦点总是集中在其文辞表现太过艳丽浮华及过度追求形式美上。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确实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时期。特别是在南朝，文学发展以骈文为主轴，越来越追求形式之美。这种对于形式的追求主要包括语言的华丽、音律之美、大量的用典及重视对偶等四个方面，并集中表现在骈文的发展上。对此现象，除了钟嵘的《诗品》已对这种倾向提出批评，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对只单纯地追求形式美提出批评，但《文心雕龙》本身却正是用骈文写成。然骈文文体严格来说并不适合用来写文论，而且《文心雕龙》对风格淡雅的陶诗一字不提，《诗品》也将陶渊明的诗、曹操的诗置于中品，而将陆机的诗置于上品。由此可见，刘勰和钟嵘其实并没能摆脱世俗的影响。另外萧统虽然非常推崇陶渊明的人品，但他的《文选》也只收录8首陶诗，可是却收录了52首陆机的诗。当时文坛的时尚风气，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和《与顾章书》，皆利用诗的语言来写信。梁元帝的《郑众论》则是用诗的语言来写人物论。北魏孝文帝的《举贤诏》、北齐文宣帝的《禁浮华诏》用诗的语言来写诏书。徐陵的《玉台新咏序》，用诗的语言来写序。曹植的《求自试表》、孔融的《荐弥衡表》及傅亮的《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都是用诗的语言来写章表。而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则以诗的语言来写文论。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刘令娴的《祭夫徐敬业文》，亦用诗的语言来写祭奠文字。此外孙绰的《丞相王导碑》及梁简文帝的《相官寺碑》，利用诗的语言来写碑文。而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则等于利用诗的语言写了一篇简要的诗赋史。如此诗的语言借助赋和骈文的形式，以恢宏的气势进入散文的领域，但诗的语言进入应用文乃至学术文章的领域，也带来很多的流弊，以至于后来力主回归古文的唐宋八大家及他们的拥护者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恢复散文的疆域和活力。不过这种“侵入”对于诗歌的发展却未必不是件好事。诗歌进入散文的领域，换句话说就是以诗歌的语言驾驭散文的各种题材。此现象也说明了六朝文学对语言形式美的追求已经达到何种程度。

至隋朝，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一味追求单纯的形式美已对文学的发展造成伤害，文学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已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六朝的文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可是，这些六朝文学的批评者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他们的批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深入加以分析。

### 李谔对浮艳文风的批评

隋末唐初对六朝文学的评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所传承。早在隋朝之前，西魏的苏绰(498-546)就曾对六朝浮艳文风提出尖锐的批评。苏绰在《大诰》中彻底否定了魏晋以来的文风，苏绰认为，为了“穆俗兴化”，必须“克捐厥

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其诚，勿愆勿忘，一乎叁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sup>1)</sup>。他的态度坚决，旗帜也很鲜明，但后来宇文泰代魏而立，他的子孙很喜欢文学，且都喜欢华丽的文风，苏绰的文体改革到最后只是一场短命的改革。

苏绰之后，隋初的李谔(生卒年不详)也是反对六朝华丽文风的代表性人物。李谔是隋文帝时期的文人，官拜治书侍御书，颇有文才。隋文帝在建立隋朝后就认为南朝政治腐败、国势不振的根源在于浮艳的文学，应对文风加以改革，李谔亦曾上书给隋文帝强力批评六朝只重视词句的华丽，内容却很空洞，完全不切实际，力陈改革文风的必要性。他在上书中说：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遂復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sup>2)</sup>

他在这段文字裡已提到文学应为教化服务的重要性，同时並抨击曹魏以后从上到下写文章只比赛词藻华丽，重视虚幻的枝节，讲究字与韵的奇巧，但文章内容空虚对治道无补，文风浮靡只会影响世风，“连篇累牍”、“积案盈箱”都是在形容言之无物文章浮滥，写再多也没有用。

由此可知，李谔反对浮艳文风，比苏绰又前进了一步。他鲜明地举起政教中心的大旗，提出要以儒家的经典为文章的榜样。他批判六朝以来体物、抒情、追求形式之美的风气，并且认为产生此种浮华风气的原因是儒家思想的衰落。李谔认为文人对“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所以才造成了“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的浮华风气。他更进一步指出，历代的帝王，离开了儒家的正道，喜欢雕虫小技，甚至以文词作为提拔官员的标准，导致文风更趋浮华：“世俗以此为高，朝廷据此擢士。利禄之途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华，遂成风俗”<sup>3)</sup>。

1) 《周书·苏绰传》

2) 《隋书·李谔传》〈上隋高祖革文华书〉

3) 《隋书·李谔传》〈上隋高祖革文华书〉

李谔甚至说：“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此言严肃指出，华丽的文学就是亡国的根源。

比较苏绰及李谔改革文风的主张可发现，苏绰的文风改革，重点在文体，他想恢复《尚书》的文体来挽救文风，而李谔的文风改革，则把文风和儒家学说的复兴以及文风和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虽然两人的观点及采取的方式不太相同，但想要改变浮艳文风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最后两者皆归失败。

### 王通的政教中心说

隋末的大儒王通，对文学上的政教中心说作了系统的阐释。王通（584？—618），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讲学着书，弟子甚多。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采道、释。王通在当时影响力并不大，或许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高之故。不过王通自视甚高，他以天下为己任，当仁不让将自己视为孔子的传人：“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sup>4)</sup>。王通的思想直到晚唐以后及至北宋时，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李翱、皮日休、司空图、柳开、孙复、石介等人，皆高度评价王通的思想，把王通视为孔孟之道的传人。王通继承苏绰、李谔的道路，借批判六朝的浮艳文风来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而且由于他站在比苏绰及李谔还坚实的基础上，因此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也超越苏绰和李谔的水平，成为隋末文学思想的代表。

综观王通的文学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王通恢复了大文学的概念。所谓大文学，就是杂文学，将一切文章均视为文学。王通之所以提出大文学的思想主张，目的其实是为了摆脱文和笔的概念纠缠，他将儒家经典扩大到文学的范围里来，主要就是想为他的政教中心说制造根据。王通说：“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

4) 王通 《中说·天地篇》

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sup>5)</sup>。“程元、薛收见子。子曰：二生之学文奚志也？对曰：尼父之经，夫子之续，不敢殆也”<sup>6)</sup>。王通把儒家的经典拉到文学的范围里来，思考方式与刘勰《文心雕龙》里提到的原道、征圣及崇经并无二致，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王通对六朝文学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刘勰却没有。

二、王通不承认文学有独立的价值，也不认为文学本身有特殊规律。换句话说，王通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而这种主张正是古典儒学文学观的极端发展，一种文以载道的主张呼之欲出，因为儒家只承认道德和政治的社会价值，而不承认文学等其他领域的价值。在这一点上，王通可说比刘勰大大地退了一步。在王通看来，文只有符合于道，“上明三纲，上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才有存在的理由。在《中说·述史篇》里，记载着这样一段对话。薛道衡对王通说：“吾文章可谓淫溺矣。”王通高兴得离席而贺：“敢贺丈人之知过也！”而薛道衡也感动得紧紧地握住王通的手，说：“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颓纲！”意思是说，象王通这样的大儒，才能纠正六朝文学的流弊，力挽狂澜，使文学回到正道。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王通对文学及审美价值的轻视。

三、王通站在政教中心说及道德中心说的立场来反对六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后来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倡导复兴儒学，正是继承了王通的思想。不过由于王通没有政治地位，他的主张在当时并未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而韩愈的古文运动，虽然打着道的鲜明旗帜，但在宋人眼裡，韩愈提倡道其实只是一种障眼法，因为韩愈的本意，主要是借道宏文，着眼点还在道而非文学。孔子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王通对文与德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德与文根本就是一体两面，德若有问题，文也无法存在。他说：“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

5) 王通 《中说·天地篇》

6) 王通 《中说·述史篇》

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sup>7)</sup>

王通将人品和文风联系起来，即所谓文如其人，自有其道理，不过他把文如其人的观点推向极端，认为有何人品就有何文风，即文学风格完全由人的道德决定，因此道德的水平就成为评价文学作品水平的唯一标准，这种主张不免太过偏激。例如李百药向王通问诗，但王通不理他。因为在王通看来，李百药问的是做诗的技巧，而做诗技巧是末流，与道无矣，因此不屑理他。<sup>8)</sup> 而由于王通不承认形式的美，他的文学史观也认为今不如昔：“古之史也辩以道，今之史也耀文”，“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而塞”（《中说·事君篇》）。对王通而言，道当然优先于艺和文，他明确地将道放在艺和文的前面：“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sup>9)</sup> 又说“美哉乎艺也！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sup>10)</sup>

在宋人看来，王通的思想更为纯正。因此真正能欣赏王通的并不是唐人，而是宋人，其中又以孙复、石介为代表，他们对文学的观点与王通较相近。在文学思想的发展史上，从唐到宋，越来越强调文学的伦理教化功能，在教化功能主义之下，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的主张愈趋向极端，而为贯彻这种文必须载道的主张，核心的问题是一个文与道的关系问题，王通在这一点上可说是宋人的先驱，因此他也在宋人那里找到了知音。

王通站在复兴儒学的立场上，对六朝浮艳文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抓住六朝文人在思想上背离儒家伦理的事实加以批判，自有其合理性。然而他完全否定文学的审美价值及文学的形式美，事实上可说是一种偏见，而这种极端的观点最后则发展成为政教中心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王通的文学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即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同时也是当时文学思想潮流的反映，而王通只不过在更进一步思考后加以系统化整理罢了。

7) 王通 《中说·事君篇》

8) 王通 《中说·事君篇》

9) 王通 《中说·事君篇》

10) 王通 《中说·事君篇》

王通的孙子王勃继承了乃祖的文学思想。王勃英年早逝，留下了《滕王阁序》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篇名句。他的文学思想与王通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王勃也认为，文学如果与道无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繇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焉。<sup>11)</sup>

《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不技而已。<sup>12)</sup>

王勃对六朝浮艳文风的批判，向上可溯及战国时代的屈、宋和西汉的枚乘、司马相如：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sup>13)</sup>

按照王勃的说法，中国的文学是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家破国亡，华靡文风不能辞其责。他将王通的观点进一步加以发挥，但其理论的不合理性亦更明显。事实上从王勃的创作实践来看，他本人的文风亦属华丽，虽然批评的之辞冠冕堂皇，但他的表裡不一并不能与王通的言行一致等同视之，不过至少在理论的表述上，祖孙两人可说完全一致的。

再者，王通将六朝的浮艳文风与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以枚乘及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联系在一起，亦自有其道理。因为从楚辞到汉赋，从汉赋到六朝的骈文，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即文学作品从古自今皆对语言形式美有一定的追求。只不过王通和王勃皆将此形式美的追求视为作家个人的行为，但其

11) 王勃 《王子安集》卷八 <上吏部裴侍郎启>

12) 王勃 《王子安集》卷十 <平台秘略论·艺文>

13) 王勃 《王子安集》卷八 <上吏部裴侍郎启>

实这是文学本身的规律所造成的，即文学从朴实朝向华美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同时，文学越是走向自己的高潮，也越会表现出一种返朴归真之美。如此由朴实而走向华丽，又由华丽而返回朴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由华丽返回的这种朴实已经不是最初的那种朴实，而是更高层次的朴实。例如盛唐之音风华秀丽而又深入浅出，本质上已经不同于《诗经》的朴实无华，而是更高层次的自然之美。文学依其本身特性而自然发展的趋势，是人的意志所无法改变的，也因此人们以各种方式企图想阻止此一趋势的努力，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 魏征等初唐史家对六朝文学的态度

初唐史家对六朝文学的态度与王通极端的政教中心说不同。原因在于王通是思想家，思想家不处理实际的事务，思想比较彻底，理论也比较有系统，而初唐史家如令狐德棻及魏征，他们都是重视实务的政治家，与重视思想的历史学家有根本上的差异。政治家考虑的问题比较实际，他们的主张可能不如思想家有理论深度，但却比较符合实际。政治家们思考的重点在于文学如何为政治服务，考虑的是文与政治的关系，而思想家们考虑的则是文和道的关系。不过从语言及引用的经典来看，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例如令狐德棻说：

两仪定位，日月扬辉，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若乃《坟》、《索》所纪，莫得而云；《典》、《谟》以降，遗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sup>14)</sup>

魏征说：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而不远。”故曰“则天”，表文明之

14)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称；周云“盛德”，着焕乎之美。<sup>15)</sup>

从字面上看，史家的言论与王通并无多大出入。不过他们真正意思其实是在强调自然是文学的本源，而人的创造则是文学的另一个本源。他们一面说文应载道，但另一面也同时承认文学应表现人的精神世界。政治家们采取兼容并蓄的方式，儘可能调和并折衷文学与自然、文学与政治及文学与教化的种种关系，使文学能更符合政治的需要。换言之，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们更关心文学对人的教化作用：

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德，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sup>16)</sup>

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坎坷而未遇，志郁抑而不伸，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sup>17)</sup>

在初唐史家的眼里，文学为政治服务与文学的抒情泄愤并无矛盾，这种态度比王通的态度要开放得多。虽然他们的思想没有王通那么深刻而彻底，但开放的态度反而给文学留下一定的空间。

在初唐史家以前，如毛诗序、刘勰及钟嵘等人，已对文与情的关系多有论述。从这些论述可知，前人并未把文与情的关系极端化，只不过他们也同样认为应该将情限制在政治允许的范围内，并认为文学应符合儒家伦理的要求，此观点为初唐的史家所继承。魏征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sup>18)</sup>

15) 《隋书·文学传序》

16) 《梁书·文学传序》

17) 《隋书·文学传序》

18) 《隋书·文学传序》

李百药也说：

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sup>19)</sup>

总而言之，唐初史家认为文学当然可以抒情，但所抒之情必须符合政治的要求。而六朝文学的靡靡之音是亡国之音，最要不得的。换言之，若文学的抒情能符合政治的需要，那文学就是可以存在的。

初唐的史家批判六朝的浮艳文风，主要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加以批判。其中又特别针对梁代的文风提出批评，认为梁代的文学内容贫乏，文体轻放，情多哀思，为害风俗，最重要的是对政治无益。

初唐史家并不认为中国的文学是一代不如一代，此点与王通的见解不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欣赏六朝的华文，只不过认为六朝文学的思想内容不够健康罢了。因此他们对语言由朴实走向华丽的发展历程并未加以指责。《周书·王褒庾信传论》里说：

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宋玉，南国词人，追逸轡而亚其迹。大儒荀况，赋《礼》、《智》以陈其情。含章郁起，有讽喻之义。贾生，洛阳才子，继清景而奋其晖。并陶铸性灵，组织风雅，词赋之作，实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体制匪一。<sup>20)</sup>

由这段文字的字里行间可看出史家对华文的欣赏，与他们的说教并不完全一致。《隋书·经籍志集部》里也说：

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部，王粲独步于漳滏。爰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初，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滋，辉焕斌蔚，辞义可观。<sup>21)</sup>

19) 《北齐书·文苑传序》

20)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21) 《隋书·经籍志集部》

这段文字本身就在极力地追求辞章之美，显示唐初史家事实上并不反对语言的形式美。

由此可见，初唐史家对六朝浮艳文风的批判，其实是对六朝政治批判的一种延伸。他们反对的不是六朝的华文，只不过要求文学应要为现实的政治服务。

## 余论

苏绰的文风改革重点在于文体，他认为应回归《尚书》的文体，藉此匡正文风。李谔则认为应通过复兴儒家学说改革文风，并主张文风攸关国家之兴亡。这两人虽然在观点及方法上有些差异，但改革浮艳文风的目标一致，而且最终皆以失败收场。

另外王通与王勃最大的错误在于将形式美视为作家个人的行为。事实上形式美的追求是文学本身发展的一种自然趋势，综观中国文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总是从朴实的内容走向重视修辞及形式，这是中国文学的自然进化过程。例如像唐诗这种发展到极致成熟的文学裡，我们反而可以发现其朴实的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朴实已非单纯的朴实，而是经过锤炼的更高层次的朴实。即，盛唐之音的形式与修辞技巧已发展至最高境界，但在这种高度的形式美中仍呈现出朴实的一面，因此这种朴实当然与《诗经》的朴实有所不同。

而初唐史家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批判六朝的浮艳文风，其中尤其认为梁代的文风内容浮华不实，对风俗与政治即对教化无益。但他们并不像王通认为中国文学一代不如一代，在其内心深处，反而欣赏六朝文学华丽的修辞，并认同其对形式美的追求，他们只不过认为六朝文学的思想及内容不够健康罢了。初唐史家虽然要求文学应为现实政治服务，但同时也采取客观及开放的态度。直到盛唐为止，他们容许科举考试考诗赋时可使用齐梁的文体，但也公开批判六朝的浮艳文风。

如此下定论也许不够周全，但简而言之，如果说在六朝时代有主张政治与文学分离的倾向，那么到了隋唐时代，文学则政治的要求及压抑下，必须扮演一定的政治角色。换言之，政治支配文学并规范文学的角色，但政治的压抑同时也给予拥有自我生命力的文学朝不同方向发展可能性。即从文学的内部而言，当时原具支配地位且为文学普遍形式的六朝骈文地位下降为一种特定的文体样式，同时因六朝文学的浮艳而引发的外部冲击，亦促成文学内部的反省，而这种反省不断延长，最后形成古文运动，除引起文学内部主导权之争外，在政治压力下，本身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亦依时代变化而改变。

总而言之，隋唐时代对六朝的文学评价可说为确立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之争，而这种理论之争则与儒教在历史及政治层次上扮演何种角色有直接的关联。政治与文学间的问题可说是贯通整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议题，而隋唐时代对六朝文学的评价可说是提供我们思考此问题的重要线索资料，因此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值得我们详细探讨。

## 参考文献

- 《二十五史》，中华书局。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  
李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隋唐五代文论选》，周祖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王通，〈中說·天地〉《隋唐五代文论选》，周祖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王通，〈中說·事君篇〉《隋唐五代文论选》，周祖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王勃，《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  
鈴木次郎，《易经》，集英社，1974。  
刘晓喆，〈唐前对宫体诗的批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4期，2006年7月。  
莫山洪，〈论隋及初唐反骈观念的形成〉，柳州师专学报，第15卷第2期，2000年6月。  
莫山洪，〈论王勃的骈文〉，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李浩，〈苏绰文体改革新说〉，文史哲，1999年第6期。  
郭鹏，〈苏绰文学改革思想述略〉，民族文学研究 2008年4月。  
吴功正，〈隋代美学概说〉，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2期，2002年6月。  
魏晓虹，何锐钰，〈试论魏徵的文学思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奚彤云，〈转型期的唐代骈文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3期，2003年7月。  
臧清，〈初唐的文学理解与文学观念的形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2007年9月。

<Abstract>

## Sui and Tang Dynasty's Criticism of the Literature of Six Dynasties

Byun sunggyu

Two different literary movements germinat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One of the movements is represented by Wangtong(王通), who attempted to build up a literary theory under the flag of traditional theory of 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for a new era,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esta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He considered that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ism resulted from the formalistic literary trend in the Six Dynasties.

On the other hand, Weizheng(魏征) stands for another literary movement. He emphasized the political role of literature. In the mean while, he affirmed the progress of literature since the Six Dynasties, and acknowledged the essential value of literature.

The politically oriented literary view caused by practical needs, such as the one by Wangtong, had been changed into the realistic literary view like Weizheng's. By those streams, literature could insure it's space to continue to exist.

Key Words : Sui Dynasty. the prophase of Tang Dynasty. clear the Six Dynasties. Politics and Confucianism. Wangtong(王通). Weizheng(魏征)

투 고 일 : 2010. 1. 10. / 심 사 일 : 2010. 1. 15. ~ 2010.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2. 15.